

张文儒 著

中国兵学文化



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
国学研究丛刊之十一



北京大学出版社

97602

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
国学研究丛刊之十一

中国兵学文化

张文儒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兵学文化 张文儒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3
(国学研究丛刊;11)

ISBN 7-301-03171-8

I. 中… II. 张… III. 军事-文化-专题-研究-中国-古代
IV. G122

书 名: 中国兵学文化

著作责任者: 张文儒

责任编辑: 刘金海

标准书号: ISBN 7-301-03171-8/E · 0003

出版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电 话: 出版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559712 编辑部 62752032

排 印 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发 行 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1 印张 275 千字

1997 年 3 月第一版 1997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

定 价: 19.00 元

序 言

中国兵学，贯及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史，像儒学、易学及其他几种主要学说一样，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人把中华文化概括为“兵、医、农、艺”，兵列榜首，这可能是为了说明中国是一个兵学思想发源较早而又著述颇丰的国度。从某种特定的视角看，也不无道理。

中国的兵书有多少，未曾有过精确统计。有人说，自古迄今，称得上兵书的，至少二千种。这一估计是否失实，姑且不论；但至少说明一点：在堪称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它的文化宝库里兵书占一个相当的比重。这些兵学典籍，不只卷帙浩繁，内容博大，而且“著述罕闻，古今卓伦”，包含的文化底蕴也相当深厚。

中国的兵书，特别其中有代表性的几种兵书，也同其余的重要学术著作一样，表现了中华文化的特有品质。只须浏览过其中几本，便会感觉到其有一种独抵华屋之下，一览群小的气度。虽说言兵，但不限于军旅之事，而是拓宽视野，将经济、政治、人文意识，宗教心理、艺术以及其他相关的各种要素，统摄于一起，使人获得一种整体印象。常常通过形象而生动的例证，给人以哲学与文化的教益。

中国兵学著作在写作风格方面也不无特色。无论是专门的兵书，或有兵学内容的哲学、历史和文学著作，大多谈今论古、气势磅礴，笔不涉同，辞有异彩。因而，人们在阅读兵书过程中，受其感染，为之叫绝，并非出自偶然。

中国的兵学,在先秦和两汉时期受到特别的重视。这几乎已是各种学派的共识。如:《汉书·艺文志》根据刘歆《七略》著录了:“兵书略”,使其与“六艺略”、“诸子略”并列。其中言道:“兵家者,盖出古司马之职……孔子曰:为国者足食足兵,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明兵之重也。”又说:“自春秋至于战国,出奇设伏,变诈之兵并作。汉兴,张良、韩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删取要用,定诸三十五家。”这些记载,对中国兵学的地位与作用,作了明确肯定和概要说明。

从东汉以后到魏晋,由于中国的封建社会进入了相对平稳的发展时期,虽说其中某些历史段落,人们对兵学仍给予一定的重视,但在总体上,它失去了昔日的显赫与光彩。中国官方的注意力集中在用儒家(有时用道家)学说教导子民与安邦治国,无形中降低了兵学的社会地位;甚至故意将兵学著作“闭锁”于深宫之内。但即使如此,并不能使兵学文化销声匿迹,它仍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影响着人们的文化观念与思想意识;而且,只要有机会将其庐山真面目昭示于天下,依然引起人们的惊愕与赞叹。

一位伟人谈到西方古代文化时曾说过:希腊奴隶社会的文明里,有很多东西是我们今天无法企及的,但它并不随着那个时代的消亡而消亡,它具有永久的价值与永恒的魅力。读到中国古代的兵学著作,人们也会有这种感觉。

怎样对待中国的兵学文化,大抵有两条思路,一条是就兵学言兵学,把兵学仅仅看成是谈论兵戈剑戟、攻占杀伐,或者扩展为战略学、战术学以及与之相关的军事建设等一类的学科。这条思路下,人们关注的只是其兵学内容,而不是其背后的文化内涵;另一条则是不为具体的兵学内容所限,是透过兵学本身,着重发掘其文化意识内涵、思维特色与人文睿智。在后一条思路下,人们虽然也会看到体现兵学特点的“雕弓宝剑”和“残钺折戟”,但看到更多的东西却是藏在其背后的中华民族的人文意识及它所代表的文化

底蕴。

本书是沿着后一条思路研究的。所研究的对象，确切地说，不是纯粹的兵学理论，是兵学文化意识。

谈到文化意识，不妨把兵学文化意识的特点略作说明。

文化，是一种社会群体生活状态；从一定的角度说，也是构成社会发展的基本要素。就文化自身的性质言，作为人体运用自己智慧的成果，属于软件。然而，在现代科学的意义上，硬件是软件的产物，软件又是推进硬件再展拓的力量，无论是人类祖先的简单思维 and 现代人的智能化计算机都是如此。人们之所以把文化这种广泛意义上的软件誉为时代之花，正是缘于这个道理。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已有几千年的发展史。它作为一个文化类型，可以从许多层面去认识。从区域划分，有所谓齐鲁文化、中原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从内容划分，有普通所谓器物文化、制度文化及认知文化；而在认知文化里，又包括儒学文化、道教文化、佛学文化、易学文化、兵学文化等。

兵学文化，作为一种特有的文化意识，常常反映出自身的特色。

有人把文化看成是两大类精神活动，一类是数学、自然科学，其中包括科学物化的技术；另一类是艺术、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这两类都是精神创造活动。兵学文化是属于其中的那一类呢？当然，从宏观看，它属于社会科学类，理当为后者；但如果仔细推敲，恐怕也含有某些自然科学特点。确切地说，从它重视对于事物性质的判定和精确的数量计算而言，类似于自然科学；而从它体现出的学说内容评估、思维特色及人文睿智，又近似于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它是这两类精神活动的有机结合或化合，而不是机械的混合。

除此以外，就中国兵学文化里的思维特色看，它至少还有整体性、兼容性和思辨性三个特点。

中国古代人的思维定势有一个显著特点，即是它的整体性。在

面对某一对象时,常常不局限于对象本身,是把对象与对象,对象与环境连在一起,探寻其运行内在法则。有人叫它是“朴素的整体性思维”,也无不可。瑞士著名兵学家约米尼有句名言:战略学是在地图上进行战争的艺术,它所研究的对象是整个战场。这一评述正适合于中国兵学理论。如在分析构成战争的要素时,孙子提出“五事”(道、天、地、将、法);吴子提出“四机”(事、地、气、力);孙臆提出“三得”(“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不得,虽胜有殃”);都是严格遵循了整体思维原则。这一思维方式的优点,在于能从宏观上把握研究对象的原貌,搜索贯串于其中的基本法则,避免大的偏向与过失。同时,也使人们的认识水准与决策能力上升到一个更高层次。

中国兵学文化的另一个特点是兼容性。这里说的兼容有不抱门户之见,取长补短,兼收并蓄的意思。人所周知,我国从先秦时起,就逐渐形成儒、墨、道、法、名、阴阳等各种学说。作为兵学,自然十分看重“兵”在社会历史中的作用,这一点毫无疑问;但也正因为“兵”是支撑一座国家大厦的鼎立三足之一(另两者是经济、政治),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与各个层面有极为密切的关系,因而以“兵”为研究对象的兵学,又丝毫不能忽视社会中其他要素的作用。这种实用的性质决定了兵学文化里不固守某种文化观念,或排斥另外的文化观念;也不毫无原则地赞同或附和其中的一种文化观念,更不是把学派之争看得至高无上,而是能在论述某一兵学见解时,使不同的观点相互掺杂、相互吸收,相反相济或相辅相成。正是中华兵学文化的兼容性格,使得它不容易走向极端。

中国兵学文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思辨性。

思辨,本来是哲学思维形式固有的特点,是古今中外的哲学所同具的,但也并不是每一位哲学家都能把思辨的特点运用得很好。不过,兵学里就有不同。由于军事运动里人的认识正确与否,常常危及国家存亡、民族兴衰和民众死活,又由于这种运动本身的变动不居和难以预知,因而,启用人的思辨能力便显得异常重要。由于

思辨,使得人的认识思路清晰,判断准确,推理合乎逻辑;也由于思辨,使得人们对已知与未知、对未知的不同认识取向,以及历史的因素与现实的因素,都能及时地把握并加以比较、鉴别、吸收,从而可能得出一种合乎事物自身发展法则的结论。同样的缘由,也使得兵学理论成为一种生动活泼和奋发向上的科学,而避免其刻板,凝固和濒于萎缩。

中国兵学文化意识里,既有如上所述的整体思维、兼容性和思辨性等诸多的特征,兵学文化的研究者们便应当不停留于兵学著作里的表面字句,而应能透过兵学内容,发掘其人文意识、思维特点与文化内涵,也就是力求把贯串在兵学著作里的作为中华民族的智能特色及文化底蕴的东西抽取和剥离出来,使之得到提炼与升华,从而对现代人有所启示与教益。

如果说,中国传统文化是一棵茂密参天的大树,那么,中国兵学文化便是生长于这棵大树上的一支独立的支干与花朵。人们透过这些支干与花朵,可以毫无障碍地窥见整棵大树。

本书之所以以“中国兵学文化”为题,理由全在于此。

最后谈谈本书研究中的取材范围。

对兵学研究的取材范围,目前学术界大致有两种取向:

第一种,以宋神宗元丰年间由官方明令颁布的“武经七书”为对象。这七本书是:《孙子兵法》、《吴子兵法》、《司马法》、《六韬》、《尉缭子》、《黄石公三略》、《唐太宗李卫公问对》。持此一取向的理由是,“七书”的裁定,是自汉代以来各个朝代史学家们对各类兵书认真搜集、整理、筛选和鉴定的结果。不仅有据可考,而且,经过世代的延续,在学术界似已成共识。

第二种,不赞成将兵学研究的对象限定在“武经七书”,而主张将视野伸展开来,即是除专门的兵书外,能从更为广泛的哲学、历史、文学著作里,搜寻并概括兵学文化的内容。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假若就兵学论兵学,会受很大的局限;只有开阔视野,广泛取材,

才能使兵学研究依托于整个中华传统文化的背景,并使其中许多精彩内容在经过一番提炼、升华后,与现代科学方法论接轨。

本书的写作,采取第二种取材方式。在有关章节里,将《老子》、《左传》、《商君书》、《荀子》、《吕氏春秋》等书里的兵学思想作专门介绍;《管子》的兵学思想虽未单辟一节,但在不少篇章里也有论及。本书对《曹操集》和《诸葛亮集》,是从兵学角度研究的。至于“七书”以外的重要兵书,如《孙臧兵法》,书中加以补正,并专作一章介绍。

047460

目 录

序 言	(1)
第一章 孙武和《孙子兵法》	(1)
第一节 孙武的军事业绩及《孙子兵法》问世	(1)
一 春秋时期战争的特点	(1)
二 孙武在吴国的崛起	(5)
三 吴楚争霸的起因与过程	(8)
四 柏举大战	(11)
五 《孙子兵法》的有关争议	(14)
第二节 《孙子兵法》精粹	(17)
一 计与战	(17)
二 力与智	(21)
三 利与害	(23)
四 全与破	(27)
五 迂与直	(30)
六 数与胜	(34)
第三节 《孙子兵法》与中国兵学文化	(37)
一 谋略	(37)
二 系统方法	(42)
三 心理分析	(45)
第二章 吴起和《吴子兵法》	(50)
第一节 战国初期的战争与吴起的生平	(50)
一 从春秋至战国时的战争状况	(50)
二 吴子其人	(59)

第二节 《吴子兵法》概观·····	(64)
一 道、义、谋、要·····	(64)
二 精兵为上·····	(69)
三 以治为胜·····	(73)
四 同安共危·····	(77)
第三章 孙臆和《孙臆兵法》·····	(81)
第一节 孙臆和《孙臆兵法》脉络·····	(81)
一 孙臆简况·····	(81)
二 战胜而强立和乐兵者亡·····	(87)
第二节 道、人、攻、变·····	(93)
一 战有道·····	(93)
二 间于天地之间,莫贵于人·····	(99)
三 必攻不守·····	(102)
四 兵势不穷·····	(107)
第四章 先秦其他兵学论著·····	(112)
第一节 《司马法》·····	(112)
一 《司马法》与司马穰苴·····	(112)
二 争义不争利·····	(117)
三 轻重相节·····	(122)
第二节 《尉繚子》·····	(126)
一 尉繚和《尉繚子》·····	(127)
二 兵胜于朝廷·····	(129)
三 战胜于外,备主于内·····	(134)
第三节 《六韬》·····	(138)
一 《六韬》成书年代的辨析·····	(138)
二 《六韬》论“道”·····	(140)
三 君之道·····	(142)
四 将之道·····	(145)
五 兵之道·····	(147)
六 战之道·····	(148)

第五章 先秦其他著作中的兵学思想	(153)
第一节 《老子》中的兵学思想	(153)
一 《老子》与兵学	(153)
二 无为而无不为	(156)
三 以正治国,以奇用兵	(161)
第二节 《左传》中的兵学思想	(163)
一 礼	(164)
二 威	(167)
三 事	(170)
四 备	(173)
第三节 《商君书》中的兵学思想	(177)
一 商鞅与《商君书》	(177)
二 义暴之辨	(178)
三 耕战	(183)
第四节 《荀子》中的兵学思想	(186)
一 荀况及《荀子》一书	(187)
二 壹民	(188)
三 相参	(194)
第五节 《吕氏春秋》中的兵学思想	(197)
一 《吕氏春秋》的来历	(198)
二 性	(199)
三 利	(202)
四 机	(205)
五 节	(208)
第六章 汉、唐兵学论著	(213)
第一节 《黄石公三略》	(213)
一 《黄石公三略》一书的由来	(213)
二 刚	(220)
三 柔	(222)
四 刚柔相济	(225)

第二节	曹操及《曹操集》	(228)
一	曹操的生平	(229)
二	以战止战	(231)
三	急农兼天下	(235)
四	唯才是举	(237)
五	赏功罚罪	(241)
六	以奇取胜	(244)
第三节	诸葛亮与《诸葛亮集》	(247)
一	诸葛亮的生平	(247)
二	《隆中对》战略	(250)
三	用兵之道,在于人和	(254)
四	先定其计,然后乃行	(258)
五	知人善任	(260)
六	长于巧思	(265)
第四节	《唐太宗李卫公问对》	(267)
一	唐太宗、李卫公及《问对》	(267)
二	势	(271)
三	奇正	(275)
第七章	兵学与中华文化	(281)
第一节	兵学与儒、道、法各家	(281)
一	兵学与儒家	(282)
二	兵学与道家	(285)
三	兵学与法家	(290)
四	兵学与儒、道、法各家的兼容	(294)
第二节	兵学文化与哲学	(296)
一	思虑应密	(298)
二	察外知内	(301)
三	巧于定计	(305)
四	胜不可壅	(309)
五	相反相济	(313)
第三节	兵学文化与现代意识	(317)

一 竞争意识	(317)
二 支配意识	(321)
三 选择意识	(324)
四 应变意识	(328)
参考书目	(335)
后 记	(337)

第一章 孙武和《孙子兵法》

《孙子兵法》是我国留传至今一部较早的兵书，相传由春秋时期职业军事家孙武所著。这部兵书传播广泛，在海内外享有盛誉。孙武本人被尊为中国兵学文化鼻祖和军事哲学理论奠基人。

第一节 孙武的军事业绩及 《孙子兵法》问世

孙武是我国军事思想史上一位著名人物，他生活在春秋末年兼并战争频繁的年代，曾亲自参与了吴国的军事建设和在历史上称为“春秋一大战”的吴楚柏举之战。《孙子兵法》里包容有丰富兵学学术思想和特殊的文化内涵，是春秋之前兵学理论建树和战争经验的结晶。

一 春秋时期战争的特点

公元前 770 年至公元前 403 年被称为我国春秋时期，原因是记载东周前半段时间的史事，主要的历史著作是鲁国的《春秋》^①。

人们知道，大约自公元 11 世纪时期，我国的周王朝开始建立。

^① 《春秋》记事的时间起于鲁隐公元年（前 722 年），止于鲁哀公 14 年（前 481 年），计 242 年。

这一社会阶段先后经历了西周、春秋和战国时期。

如果说，西周时期社会的发展还较为平静的话，到春秋时代，便进入了频繁的兼并战争时期。

自周平王东迁以后，王室逐渐衰微。大大小小的诸侯不再听从天子的命令，也不再定期向天子纳贡、朝觐、述职。春秋初期，王室还拥有今河南北部、西部，陕西东部一个相当大的地区，后来则有许多土地相继赐给了诸侯，有些被郑、晋、秦、楚等大国或戎族相继夺取了去。春秋中期以后，天子实际上拥有的土地和人口已很少，势力也变弱，甚至下降到一个中等诸侯国的地位。天子的威信也日益降低。

与王室衰微的同时，各诸侯国逐渐强大起来。起初时诸侯国有140多个，包括鲁、宋、卫、陈、蔡、曹、郑及晋、楚、齐、秦等。经过频繁交战，小国相继被灭掉，大国脱颖而出。直到后来，形成五霸迭兴的局面。照一般说法，五霸是指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宋襄公、楚庄王。实际上，宋襄公未能称霸，而吴国和越国，却先后进入大国称霸行列。所以，春秋时期的大国应是齐、晋、秦、楚、吴、越六国。

最先称霸的是齐国。齐在春秋前期，已是东方大国。据《史记》记载，齐原属东夷，僻处海滨潟卤难殖之地。周成王将姜太公分封到此，“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①。齐襄公死后，其弟桓公继位，任用管仲为相，四十年间，通货积财，冠带天下，且勤政爱民，荐贤用能。由于持续采取富民强国政策，一跃而为当时列国诸侯之盟首。

齐国之后是晋。晋原是汾水下游一个小国，到春秋前期，逐渐强大。到晋献公时，兼并或控制了数十个小国和戎、狄部落，疆域扩大到整个汾水流域。献公晚年，因废嫡立庶，燃起王朝集团内部纷争，公子重耳在外流浪19年，终于回国。在大臣狐偃、贾佗等人的

^① 《史记·齐太公世家》。

协助下，厉行整顿国内的政治与经济，如“轻关易道，通商宽农，懋穡劝分，省用足财”，以及“赋职任功”，“举善援能”^①等。结果，使得国内政治稳定，社会经济得到发展，国家逐渐富强起来。

这时，地处南国的楚一再向北侵犯，而在它边缘地带的鲁、郑、陈、蔡等国先后归附于楚。公元前632年，楚围宋，宋向晋告急。晋文公率军救宋，会同宋、齐、秦军，在城濮（今山东鄄城西南）一战，大破楚军。战后，晋文公又大会诸侯于践土（今河南原阳），于是，文公成为继齐桓公之后的中原霸主。

晋文公之后，有楚庄王及吴王阖闾与越王勾践相继称霸。由于这三国与吴楚争霸直接相关，放在后面详说。

在上面的几个国家争霸之后，还有一个争霸的国家是秦国。

秦原是陕西西部一个小国。西周灭亡，秦襄公护送平王至雒邑（今河南洛阳）有功，被封为诸侯，以岐地为中心，势力逐渐扩展。在秦穆公（前659—前621年）时，任用百里奚为大夫，修明政治，奖励生产，国家逐渐富强。疆土向东扩展，与晋相接。此后，秦相继举兵伐晋，大破晋军于韩原（今山西芮城），生俘晋惠公；后来的秦、晋交战间互有胜负。由于秦的东向为晋所阻，只能转向西戎地区发展。《史记·秦本纪》曰：秦穆公“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

总之，春秋中叶后，各个大国间争霸激烈，江、河流域所有的大、小诸侯国都被卷入，兵连祸结，时无宁日。晋、楚两个大国相持不下，小的国家普遍厌战。这样，便产生了前后两次以罢兵言和为宗旨的弭兵运动。第二次会盟后，晋楚之间四十多年未发生大的战争，其他国家间的战争也很少，这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 and 人民生活的安定很有好处^②。

① 《国语·晋语》（四），懋，勉也；穡，庄稼；劝有分无。

② 关于弭兵之会的史实，请参见张传玺著《中国古代史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93—94页。